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二）**  
**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林金水

## 艾儒略与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

天启年间在西安附近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国基督教史、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蜚声中外。然而比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早几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在泉州发现的基督教的石刻十字架，在学术界还鲜为人知。在新的考古和历史文献尚未发现之前，它的发现应是中国基督教史上首次发现的基督教文物遗迹。这块石刻十字架的发现是与明末来华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泉州的活动分不开的。

拙文试就此作一勾勒。

### 一

艾儒略（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字思及，1611年前后抵达澳门。在澳门停留一段时间后，1613年，艾氏最终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在南京、杭州、北京、商州、绛州、扬州等地传教。1624年，艾儒略居住杭州期间，结识致仕归里的明末大学士叶向高，应叶向高的邀请，随叶氏入闽，于是年底抵达福州。嗣后，在闽活动达25年，足迹遍及八闽，广泛结交士人，传播天主教信仰和西学，有“西来孔子”之称。1649年6

月 10 日，卒于延平山中，后其门徒将其遗体葬于福州北门十字山。

泉州是艾儒略在闽活动最重要的府城之一，曾九进九出，影响至深，而交游的士大夫，人数之多，官秩之高，影响之大，为八闽之首，如大学士蒋德璟、黄景昉、曾櫻、林欲楫，尚书苏茂相，侍郎何乔远、张维枢以及庄际昌、周廷鑑、林维造、郭燦、池显方、张赓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地区士大夫（包括曾在泉州任职的官员），至少有 72 人。<sup>①</sup>

艾儒略第一次进泉州是在 1626 年，“天启丙寅（1626）……是岁正月，大西艾先生来郡”<sup>②</sup>。

第二次到泉州是在“崇祯己巳（1629）冬季朔三日”<sup>③</sup>。

第三次入泉州是在 1633 年 4 月底，由漳州返驾泉州。<sup>④</sup>

第四次入泉州是在 1634 年元旦，“崇祯甲戌（1634）元旦，晋江陈养初……求艾师开发”<sup>⑤</sup>。

第五次适泉州则在 1634 年 9 月 28 日。<sup>⑥</sup>

第六次到泉州是在崇祯八年八月二十三日（1635 年 10 月 3 日），艾先生驾往清漳，道经泉州。<sup>⑦</sup>

第七次入泉州则在 1637 年，“十年丁丑，春王正月，艾先生自莆阳再入温陵”<sup>⑧</sup>。艾儒略这次在泉州住了四个多月，直到闰

<sup>①</sup> 详见拙文《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5 辑，1995）和《艾儒略在泉州的交游与传教活动》（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台北，1994）。

<sup>②</sup> 李九功：《励修一鉴》（手抄本）下卷，第 24 页。

<sup>③</sup> 同上。

<sup>④</sup> 艾儒略：《口铎日抄》卷 4，明崇祯刻版。

<sup>⑤</sup> 李九功《励修一鉴》（手抄本）下卷，第 36 页。

<sup>⑥</sup> 艾儒略：《口铎日抄》卷 6，明崇祯刻版。

<sup>⑦</sup> 李九功《励修一鉴》（手抄本）下卷，第 10 页。

<sup>⑧</sup> 艾儒略：《口铎日抄》卷 7，明崇祯刻版。

四月五日才离泉州赴桃源。

艾儒略第八次再返泉州是在崇祯十年七月（1637年8月20日至9月17日），“先生复返温陵”<sup>①</sup>。

艾儒略第九次入泉州是在1639年，“己卯春正月主日（1639年2月3日）”<sup>②</sup>。

艾儒略在泉州地区传教时，该地曾先后发现了四块十字架石。

泉州发现的第一块十字架石是1619年由郑孩如在武荣山中为建“读易窝”掘地发现的。1629年冬艾儒略第二次到泉州时，与其门徒张赓<sup>③</sup>一起到郑孩如家，看到此十字架石，确认为基督教遗物，并借此机会解释十字架石的真意。张赓与郑孩如的儿子郑东里为儿女姻，张赓的二女婿是郑东里的儿子，所以对该十字架石发现的经过，知之甚详，因而特撰《武荣出地十字架碑序》一文记载此事：

万历四十七年（1619），有石刻十字架，从武荣山中为孩如郑公开现，莫辨何代神物。天启三年，关中掘地，亦得景教碑颂，其额镌十字架，按视武荣碑，刻画无异。惟是关中碑，有文有字，知为唐刻，与今西师传述降生十字架诸踪，洎教诫规程，语语皆符。武荣碑固不立文字，而孩如公博奥格致，意是不可弃不可亵，珍而竖诸读易窝垣间，其有

<sup>①</sup> 艾儒略：《口铎日抄》卷7，明崇祯刻版。

<sup>②</sup> 艾儒略：《口铎日抄》卷8，明崇祯刻版。

<sup>③</sup> 张赓，字夏詹，又字明皋，圣名玛宝，万历丁酉（1597）举人，授平湖教谕，后补河南原武县令，越数年，调任广东某县令。1607年，张赓在北京见过利玛窦，1621年在杭州认识艾儒略，并从艾氏洗入教。张赓致仕归里后，紧随艾氏，“帮助艾司铎开教，为教众所仰望”（《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第173页。河北献线天主堂，1937年），成为艾儒略在闽传教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此主神迹，且有关中碑印证，尚未及闻，惜其往矣。

极西铎德艾师思及，从九万里来，敷教中土，入我八闽，夙为余承教之师。崇祯二年，载至温陵，而余适归休，与同志肇建郡之主堂于崇福古地。余仲倩，即孩如公孙，乃于艾师座间，获聆圣架真诠<sup>①</sup>，而述此碑，余亟偕师往观，相与感仰赞礼。越今五载，堂事粗亢，遂胥奉而鉴堂中。<sup>②</sup>

福清教徒李九功与张赓同为艾儒略在闽传教的得力助手，在他所撰的《励修一鉴》下卷，有同样的记载：

谢君懋明者，晋江庠士也。其尊公受谦先生，于乡绅中最称笃行，不奉邪教，七十八岁方得懋明，诫以勿作佛事，勿烧纸。谢君恪遵庭训。

天启丙寅（1626），憩修笋江书斋，夕坐，忽闻空中有声曰：‘三一道也者。’令奇须臾离也。是岁正月，大西艾先生来郡，谢君未知，但念三一不离之语，必有真谛。迨崇祯己巳冬朔三日，于其室中倏闻异香，殊非人世间有，恍然醒目：‘是必有异人，当亟访之。’诘旦，道武荣，先访其妹倩

<sup>①</sup> 艾儒略所述十字架真诠，可由《口铎日抄》得到佐证：“夫十字架者，初直刑具耳。一经吾主受难，救赎我众，遂无不尊之崇之，爱之慕之，且有加之冕旒之上者。以故泰西诸国，将寻到之圣架，各各分之，珍为至宝。”（卷2）“吾主钉于架上，吾侪抚膺流涕，顾瞻斯架，有上下左右之义焉。上者，以至高无上之主，为我等悬于斯架，宁无动我超然向上之思，曰：惟是仿主以自淑乎；下者，以至善无瑕之躬，为我钉于斯架，宁无动我兢兢谦下之念，曰：惟是卑以自牧乎。左右者凡人左手恒弱，右手恒刚，法左之善忍，法右之刚强，且默思不可与此架之恩相左，又安可不如右之强有力者，以勉承此恩乎！”（卷6）

<sup>②</sup> 《熙朝崇正集》（明刻板）卷一，张赓《武荣出地十字架碑序》，皇明闽景教堂辑。

不遇，便往其中表郑文学东里家，东里乃孩如先生长公，与张夏詹先生为儿女姻。是日，正邀艾西师共赏其家所得十字架古碑。此碑有画无文，孩如先生未知天主教，莫详何代神物，但竖置廊庑间。艾西师此日方与夏詹先生欢赏摹榻，而谢君适至，恍悟异香之缘。启翼到此，乃细叩宗旨，豁信囊空中闻声三一，正为三位一体之义也。感激主恩，金议建堂郡城。先就艾西师讲解，亟领洗焉。

耶稣会士阳玛诺在《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对此也作了记载：“泉郡南邑西山<sup>①</sup> 古石圣架碑式，万历己未（1619）出地，崇祯戊寅（1638）摹勒。”

泉州发现的第二块十字架石，是艾儒略在崇祯八年（1635）第六次访问泉州期间，在李坑乡发现的：

教中传奉十字架，不知来历者，每多致疑不信。惟我慈主悯下，乃屡假符节以示之。万历四十九年有石刻十字架从武荣山开现。至天启三年，关中掘地得唐景教碑颂，碑颂亦镌十字，今摹印真迹，现存省直各堂可考也。又泉州李坑乡离城五十里许，有熊岭庵柏树下，于崇祯八年四月末旬，夜发火光，乡民疑地下藏金，每聚众发掘，拨开乃石板，中书有十字也。众不知为何神物，时有奉教友颜伯尔纳焉，馆近

<sup>①</sup> 见阳玛诺著、艾儒略校：《唐景教碑颂正诠》，转引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86—8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西山与武荣山似一地之不同别称，但有待文献证实。关于“西山”，穆尔注释如下：“西山在《泉州府志》的现代地图上有标志，1612年的地图1、2，在南安县西南。据《泉州府志》（卷四）记载，南安在泉州西15里；在不莱齐贝德的地图（1900）上是6公里；据《汉学杂记》（第12册，第96页）记载是在泉州西北45里；在理查德地图（1908）上是在泉州西北20英里。”

其处，乃为阐明圣教，乡民始闻其略，至八月念三日，艾先生驾往清漳，道经其处，直往瞻仰，果如所言，谨将十字石暂置公所，俟后来信慕者多，公建圣堂，是亦圣教征证一奇去 [趣]。①

第三块和第四块十字架石，是在 1638 年发现的。其发现与艾儒略虽无直接的联系，但在艾儒略影响下，泉州士大夫却有了保护十字架石的意识。

发现第三块十字架石的是与艾儒略交游的户部尚书苏茂相的太翁发现的，根据阳诺著、艾儒略校《唐景教碑颂正诠》，阳玛诺的注释如下：

闽泉州城水陆寺中，有古十字架石，为大司寇苏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祯十一年二月（1638 年 3 月）中，教友见之，于吾主受难之前日（4 月 1 日）奉入圣堂。②

苏茂相，即《艾先生行述》提到的与艾儒略“谊笃金兰”的“苏司徒石水”，字宏家，号石水，万历辛卯（1591）、壬辰（1592）联第进士，时方二十六，授户部主事，累官至金都御史巡抚浙江，晋总督仓场，户部尚书，改刑部尚书。茂相为人恬静谨凛，藏才不露，为官政声懋著。在他巡抚浙江时已与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杨廷筠结交，杨与苏同科进士，杨廷筠还为其父苏士潜出版《苏氏家谱》。由此可推断，苏茂相有可能早在杭州已与艾儒略会晤过。他为艾儒略交游甚深并对基督教加以保护

① 李九功：《励修一鉴》下卷，第 9 页。手抄本。

②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 89~90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的是他与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作序留下的影响，他赞同基督教所说的造天地万物天主的存在，对《三山论学记》作了最精辟的概括：

《三山论学记》者，泰西艾子与福唐叶相国辨究天主造天地万物之学也。夫天地万物，自必有以造之者，穷无穷，极无极，稽其所以造之者，天主是也。然艾子以天主为降生救人，而天堂地狱实为天主掌罚之具。盖其国历来尊信教法如此。……窃叹诸葛武侯读书观其大意，不以寻章摘句为能。如艾子所论，尊崇天主，欲人遵行教诫，返勘吾身从何而生，吾性从何而赋，今日作何事，他日作何归，真真实实，及时勉图，如人子之事父母，起敬起孝。此则其论学之大意，余虽千百言，以此数语蔽之可也。<sup>①</sup>

从苏茂相与艾儒略的交游，人们不难看出，苏太翁发现的这第三块十字架石，能够保存下来，并奉入教堂，与苏茂相之受艾儒略影响不无关系。

第四块十字架石是在崇祯十一年二月发现的。根据阳玛诺著、艾儒略校《唐景教碑颂正诠》，阳玛诺的注释如下：

闽泉州府城。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旧有东禅寺。《郡志》云。唐乾符（874—879）中。郡人构庵居僧齐固。广明元年（880）。更名东禅。后废。近寺百武许。有古十字石。在田畔。未有识者。于崇祯十一年二月。吾主复活之四日（公元1638年4月7日）。教友因拜墓见之。三月望

<sup>①</sup> 艾儒略：《三山论学记》，《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一册，第421—423页。台北。

(4月7日) 前同教者恭奉入圣堂云。<sup>①</sup>

耶稣会士费赖在《艾儒略传》中也提到：“1638年泉州附近有人掘地得古石数块，皆雕作十字架形。华人酷好古物，争往观之，中有数人始因好奇而来，终乃入教。”<sup>②</sup>

## 二

泉州发现的四块十字架石，尤其前两块，在泉州文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纷纷作诗给予赞美，并对艾儒略表示尊敬。

在这些士大夫中首推晋江庠生、教徒谢懋明，从上引《励修一鉴》的记载，人们可以看出，武荣十字架石发现和确认的经过，也就是他受洗入教的经过和动机。他赠给艾儒略的诗，既是对泉州十字架石发现的赞美，又是对他本人皈依基督教的感悟的抒发：

何处异香过，繇来天主祥。碑留十字篆，架隐百年章。  
方慰趋承近，俄惊别恨长。三山需后会，教在不言中。<sup>③</sup>

另一个作诗表达武荣十字架石发现的是教徒苏负英（字荐卿），他与艾儒略的交游，也是过从甚密，曾校阅艾儒略《圣梦歌》（1637）。在他诗中明确指出武荣山十字架的发现：

<sup>①</sup>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87—8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sup>②</sup> 费赖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35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sup>③</sup> 吴湘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674页。

吾师海外至，海道与云连。……荒碑关陕涌，古石武荣妍。石浸圣架迹，碑纪贞观年。<sup>①</sup>

虽然武荣碑先于大秦景教碑的发现，但因其无文字记载，闽中诸公对景教的认识主要是从大秦景教碑获得。<sup>②</sup>

莆田诗人柯宪世<sup>③</sup>诗：

“天元该大道，有主是真因。……大千宁净土，三一信分身。景宿祥长着，波斯曜革新。七时勤礼赞，十字俨持循。重译来中土，流行仰大秦。念念宗孔圣，友德愿为邻。”

德化林煥<sup>④</sup>诗：“主像亦非支，降生原有纪。异星三君朝，神天宣庆祉。掘地得唐碑，贞观天教起。沉埋乱世非，昭明清朝喜。嗟哉龌龊人，西镐天讪诋<sup>⑤</sup>。”

昭武吴维新诗：“著书千百言，磨碑印十字。”<sup>⑥</sup>

福州周之夔<sup>⑦</sup>诗：“捧出河图告帝期，经行万里有谁知。浑天尚有唐尧历，中国犹传景教碑。”

福州陈耀诗：

<sup>①</sup> 吴湘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678页。

<sup>②</sup> 福建士大夫是从张赓那里获得景教碑颂，这从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得以佐证，“卢居灵竹间，岐阳同志张赓虞惠寄唐碑一幅曰：迩者长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国碑》，此教未之前闻，其即利西泰氏所传天学乎？余读之良然。”（《熙朝崇正集》卷二）

<sup>③</sup> 柯宪世，字尔珍，莆田人，柯昶侄儿。万历中诸生，官翰林侍诏。清朝以子士芳赠金事。著有《九鲤湖志》。

<sup>④</sup> 林煥，字仲漠，德化人。南国子监太学生。著有《南舟草》、《松鳞草》等。

<sup>⑤</sup> 西镐共讪诋：出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

<sup>⑥</sup> 吴湘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659页。

<sup>⑦</sup> 周之夔，字章甫，闽县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初授苏州府推官，督兑漕粮仓。后因漕粮事辞官归乡。南明弘光元年（1645）夏官给事中。著有《弃草》十五卷，《弃草二集》二卷。

“卓哉绝世才，壮此三山色。古初诚可复，景教思无极。”<sup>①</sup>

以上有关基督教教义的诗句均出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河，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生于大秦，景宿靠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sup>②</sup>

武荣碑尽管没有文字，然而它的出土在明末天主教教徒看来，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可以与景教碑相媲美。张赓在《武荣出地十字架碑序》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於戏！武荣去关中数千里，不相谋之地也；唐去今且千年，不相谋之时也；有文字关中碑，与无文字武荣碑，又不相谋之刻也。而此圣架遗迹，截然合符。两碑后先出地，若有期会。西师持关中刻方来，倏从语次，得兹证佐，又若有假以机缘。

嘻！我等知主不在目见，纵令无印无证，亦接且必信必

<sup>①</sup> 吴湘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 687、650、672 页。

<sup>②</sup> 《熙朝崇正集》（明刻板）卷二，《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诗句所引景教碑语录，原出之圣经福音书故事。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既是对景教碑也是对赠诗所作的最好的注释：“所云先先无元，后后妙有，开天地，匠万物，立初人，众圣元尊真主，非天主上帝畴能当此。其云三一妙身，即三位体也。其云三一分身，即费略降诞也。其云同人出代，云室女诞生于大秦，即以天主性接人性胎于如德亚国室女玛利亚而生也。景宿告祥，异星见也。睹耀来贡（原文为波斯睹耀以来贡），三君朝也。神天宣庆，天神降也。亭午升真，则救世传教功行完，而日中上升也。至于法浴之水（原文为法浴水风），十字之持（原文为印持十字），七时礼赞，七日一荐，悉与利氏西来传述规程吻合。”

尊。然而信者希尊者，希吾主乃今显示符节，宛如谆谆命之也。

异哉！此架累代秘藏，于今耀灵，肆我皇睿民间生，小心昭事。而此日在郡当道<sup>①</sup>，又咸志修安，知所钦崇，寰寓绅衿氓萌，亦多翕然共宗。是盖休明有开，巧相际会乃尔，于是莫禁喜溢僭为述叙，几弘此道以永。<sup>②</sup>

福清教徒李九功<sup>③</sup>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信教，则把泉州十字架石的发现看成是上帝降生中国拯救世人的有力证据：

或谓天主降生为普救人群，何以我中土，悉乏证据耶？孰知吾中土经书，一灾于洪水，再灰〔毁〕于秦火，与如德亚国之古经全存者不同。迨既降升天后，圣宗徒多默尝偕数弟子传教及于中华。嗣后门人接踵，且数百年不绝，以故中华至今多存圣教旧迹。……迨万历四十九年有石刻十字架，从闽泉郡武荣山中开现，二证；又至天启三年，关中掘地，得唐景教碑颂，碑颂额镌十字，碑文详瞻有礼，悉符诸西士所传，今摹印真迹，现存省直各堂，三证；又泉州李坑乡有

① 指曾樱，艾儒略在泉州活动时，曾樱为兴泉道。曾樱，字仲含，号二云，峡江人。万历丙辰进士，先为漳南道，会剿九连山洞寇有功，崇祯四年任兵巡兴泉道，故《艾先生行述》称其“光泉道令冢宰曾公一〔二〕云”。唐王时以工部尚书进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著有《四书五经管见》、《节敬日草》。尽管曾樱“讲性命学为八闽所宗”，但他对外来的宗教思想采取了宽容态度。在基督教徒受迫害最甚时，他作为当权的地方长官，与蒋德璟一道采取了“远人则可矜”的政策，保护了一大批教徒。因此，曾樱也就成了艾儒略在福建“谊笃金兰”的好友之一。

② 《熙朝崇正集》（明刻板）卷一，张庚《武荣出地十字架碑序》，皇明闽景教堂辑。

③ 李九功：《慎思录》第一集，第33条。清绿庄堂藏版，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编号7227。

熊岭庵柏树下，于崇祯八年四月末旬，夜发火光，乡民掘地得石板，中画一十字，不识为何代神物，艾西师闻之，乃亲往瞻仰，恭奉置公所，四证。若斯灵迹叠见，孰非上主仁夏悯下。将俾我中土，既观既闻人士，曾增其钦崇感慕之诚者乎，安得以悉乏证据而不信远方真传也哉！

从以上泉州发现的四块十字架石，尤其前两块，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艾儒略的辨认，才得以使明末泉州的士大夫认识到，它们是基督教的遗物，并由此得知基督教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在他们的故里传播和活动过。至于在何年代，他们当然不可得知。原因很简单，元末的兵荒马乱造成的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使得基督教在泉州活动的历史遗址和文献荡然无存。只有到了近世，随着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人们才从西方的文献找回这段被淹没、被割断的历史——元代天主教方济各会在泉州的传播与兴盛，从而也才有可能，使 20 世纪在泉州的有关景教碑的考古发现，没有出现过“莫详何代神物”的茫然无知，人们至少知道这是基督教的文物。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明末泉州发现的这四块十字架石，是否遗失或保存下来，抑或与后来发现的景教碑有关？<sup>①</sup> 人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能说的是，明末泉州武荣山发现的十字架石是对元代天主教在泉州传播历史的最早见证。

<sup>①</sup> 作者曾就此作过推测，见《艾儒略在泉州的交游与传教活动》。不过现在看来似牵强附会。